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吴元迈

吴元迈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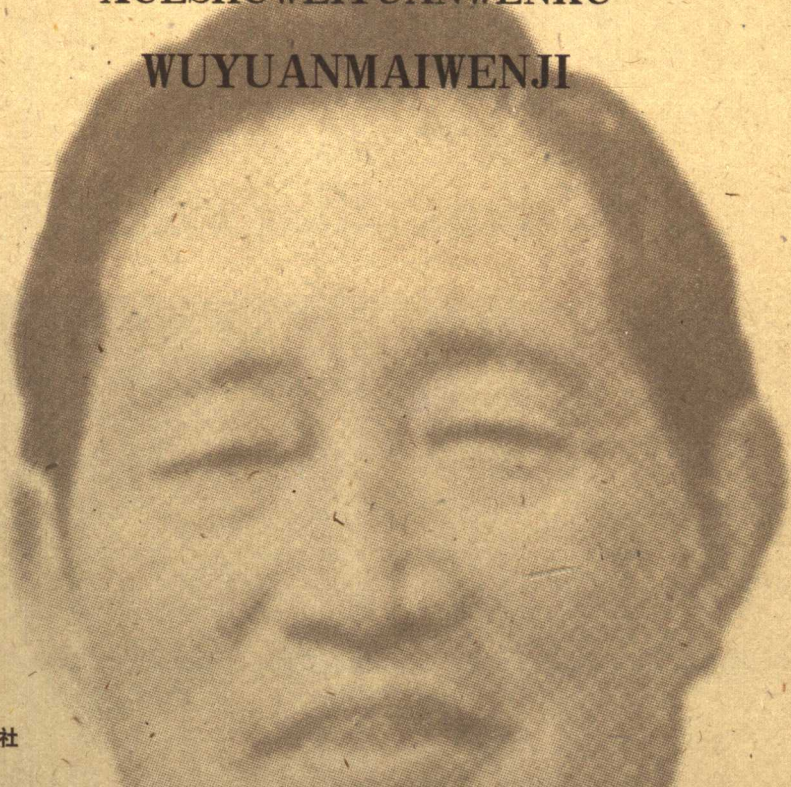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WUYUANMAI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吴元迈

吴元迈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WUYUANMAI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RBZ-19/25



吴元迈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本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吴元迈

小传

吴元迈，安徽歙县人，1934年生。1953年6月毕业于安徽徽州师范学校，同年秋入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4年秋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后去苏联留学，先后就读于基辅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1960年夏毕业。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62年起开始发表论文。1964年9月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即转入该所至今，曾先后担任苏联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学者”称号。1984年春起任硕士生导师，1991年起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评审组组长至今。1991年春至1998年底，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主编，并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1991年至1996年兼所党委书记。1997年至2001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起任名誉委员。1993年至2004年6月任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会长，2004年6月起任顾问。1986年起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2000年任会长至今。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起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

自序

岁月悠悠。我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不知不觉已 43 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刊登在《光明日报》(1962 年 1 月 28 日)上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这标志着我学术生涯之开始。

然而，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到“文化大革命”终结这漫长的 15 个春秋里(人的学术生涯有多少个 15 年!)，我的科研工作时断时续，更准确地说，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下，我的青春年华主要并不用于本职工作，而是用于劳动锻炼、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情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与共同命运。

1960 年 7 月，我从苏联留学归来，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习与教育，于 11 月 7 日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到，被分在那时的苏联东欧文学组工作。按当时归国学生的规定，不久便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皖南歙县农村探亲。一个多月后，我从家乡回到北京正式参加工作。大约工作了两个月，于 1961 年 3 月，在那时的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的率领下，和两位从东欧留学归来的同事一起奔赴河北高碑店，参加由中宣部组织和领导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宝权同志和我们一样，刚刚从中苏友协正式调入文学研究所。我们风雨同舟，在河北农村张八屯一道工作和劳动了 8 个多月。那时正值我国“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回所以后，主要从事苏联文学动态研究，偶尔也

写点文章在报刊发表,这期间还参加了一个月的劳动锻炼,这是那时科研人员的“必修课”。

1964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由文学研究所的几个外国文学组和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共同组成新的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我和所内大多数同志便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所长冯至和书记王平凡的率领下,立即打起背包,赶往安徽寿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1965年春才从那里撤出。返回北京后,整个首都文化思想界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从批判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扩展到了批判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中苏两党的争论和分歧日益公开化和尖锐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除了大量的政治学习外,我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用来从事苏联文学动态研究,并为内部刊物《外国文学动态》写稿。

没过多久,1966年5月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表,紧接着《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它不仅把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研究所,也把我的家庭和我个人带入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之中:1969年10月初,我被隔离审查。1970年下放“五·七”干校,边监督劳动边接受批判。今天,好在这一页早已被翻了过去。

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学术和时代的关系,历来休戚相关。我的科研工作,严格来说,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开始的。起初还经历了一段过渡期。那时我参加了苏联文学研究室的《苏联文学大事记·1953—1976》一书的编写工作;同时和同事们一起,分别前往北京化工厂和北京汽车厂下属单位边劳动锻炼边“开门办所”。厂里的工人理论小组也参加了该书的部分工作。这是我们研究室集体对当代苏联文学的历史变迁所做的一次认真而全面

的梳理,虽然限于时代的条件,其中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站不住脚,但史料的丰富性则是不能忽视的。该书已于197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内部发行)。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拓创新的文学新时期在我国全面展开。我和同事们一样,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满怀解放的喜悦与激情,重新拿起笔来,积极投入到清算“四人帮”在文艺领域中散布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及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主义的斗争中去,并于1978年发表了两篇文章:《题材多样化与小中见大》与《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这是我在中断十余年的著述之后首次发表的文章。前者是我对“四人帮”在文学题材问题上的谬论所作的反拨与批判,并提出文学题材不应受到限制,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小”题材作品,却鸣奏出了时代的强音。后者是为我所《世界文学》杂志的复刊而作,意在介绍和总结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如何同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斗争。该文开宗明义地写道:“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和文艺运动中这一重大历史斗争,学习列宁在这方面的许多远见卓识的指示,对于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动观点,应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8年,对于我是难忘的一年,是我学术生涯的新起点。这本文集收入的34篇论文,均从1978—2003这25年间的论文中选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我国文学实际,联系、思考和总结苏联文艺运动中某些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苏联文学思潮和理论中某些重要的变化,是文学新时期以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也是这本文集的主要内容之一。除文集中收入的那些论文以外,尚写有《苏联30年代“写真实”口号提出的前后》、《苏联当代现实主义

思潮》、《50、60年代苏联思潮简论》、《70年代苏联文学思潮和理论探索》、《苏联文艺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命题——“开放体系”》等。也有一些文章诸如《“首创权总是属于他的”》（“他”指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等，则是针对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歪曲别林斯基文学遗产而发。

我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前面已谈到，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批评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这并非偶然。大学时代，我师从C·C·杰尔卡奇。他那时刚洗清多年的不白之冤，从监狱出来后，重新登堂执教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课，同时开设“文论家和批评家普列汉诺夫”的专题课。我在他那里学习和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约两个学期，每周一次，都是晚上授课。后来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大学毕业论文《普列汉诺夫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他是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启蒙老师，我在他那里不仅在做文也在做人方面都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1978年以后，我重新回到这一课题上来，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除本文集收入的那两篇之外，还写有《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普列汉诺夫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以及应邀为《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一书而写的专章《普列汉诺夫》。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是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这一研究的重点。

进一步推动我走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路的，是同1979年发生的两件事情有关：第一，这年年初，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文章。我以为事实并不如该文所阐述的那样，因而于同年写了一篇《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文章，参加讨论和争鸣。第二，1979年9月，南京大学等6所江苏高等院校在浙江莫干山召开《马

列文论手册》编写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承担了为该书撰写《艺术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斯大林论文艺的总倾向性》等文章。从此我同高校讲授马列文论课的老师有了联系、合作和交流，并且将这一美好的友谊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此后，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再限于普列汉诺夫，而是扩展到了它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了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这集中体现在我 15 年前发表的《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12 日）的文章里：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产生于 19 世纪，但其意义与影响是不能限制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的。它不只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理解文艺的本质与功能、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文艺批评的标准，以及 20 世纪文艺发展的过程等，同样是适用的，决不会过时”。这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文艺基本原理，是文艺实践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客观真理，其历史的创新性和方法论的优越性，是任何过去与现在的其他文艺理论学派无法比拟的”。因而不乏西方学者也指出：“在美学与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学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在学术性的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几乎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这确实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

第二，长期以来，国外和国内都有一种看法，以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没有完整体系，只有一些零星的、散见各处的意见，没有专著，有些则是非正式著作如书信等”；从形式上看，的确“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点的系统性不如他们的哲学和经济学，这是事实。但是，他们的文艺观点是同他们的全部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

且是他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无论从它们历史的创新性、严密性、科学性及方法论看，都是自成体系的，而且是人类文艺学发展中的崭新体系。再说，古往今来的一切理论体系，并非都是由鸿篇巨制这一种形式构成，其形态往往多种多样”。

第三，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今的世界文艺不仅与 19 世纪的文艺、20 世纪初的文艺不同，也与二次大战后那些年代的文艺不同，的确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碰到过的，既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加以探讨和研究，也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向前推进”。然而，“撇开他们的基本原理和他们所奠定的基础，是不可能真正的推进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和人类文明同步”，“应该不断地吸收当代人类文艺学和人类文化中一切积极的、有益的、优秀的成分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发展的需要。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历史行程中，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在今天，我们决不应该中断这一生动的历史行程”。

第四，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过程中的各种经验，不断地检验、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有哪些成分只具有历史意义，而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哪些成分强调得不够，应当加以丰富和完善；哪些成分没有提到，应当加以补充和发展”。同时，“应该看到，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中确有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以来注意不够或未曾提出的”。

正是基于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种认识和理解，1979 年以来我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除本文集收入的外，尚有《恩格斯论现实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俄罗斯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化进程与世界文化》、《列宁

文艺思想研究在苏联》等,以及《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思考》等。

文学理论问题研究或国外文学理论问题研究——这是我的第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也是本文集的主要内容之一。1978年以来,我在这方面陆续写了一系列论文,来阐述国内外文论进程中那些具有迫切意义和开拓意义的理论问题,它们涉及到文艺学的方法、观念、格局、继承和借鉴等诸多方面。除本文集收入的那些论文以外,尚写有《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关于文艺方法论的思考》、《艺术接受问题》、《关于文艺观念的变革》、《浅论人类文化成果的吸收与借鉴》、《“卡尔斯·塔特博士”与“野蛮人”——关于文艺的“旧”和“新”》、《人类文化宛如人类的交响乐》等论文。

——这就是我40余年来科研工作的基本经历,也是我学术探讨的基本方向。这本文集由于字数的限定,只收入了我发表的部分论文,但我以为,它们仍然反映了我的学术探讨之基本轨迹、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

吴元迈

2005年3月

目 录

自序	1
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1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 ——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研究的历史考察	17
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	31
生活之路和现实主义之路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56
普列汉诺夫论列夫·托尔斯泰	69
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82
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	110
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	126
列宁的反映论与文艺	137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	150
文艺与意识形态	165
毛泽东论文艺的民族特色	184
略论文艺的人民性	203
关于艺术领域的人学之思考	224

关于文艺批评的随想	232
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	240
20 世纪文学观念的格局	
——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	253
文学本体论的历史命运	272
论今日之“拿来主义”	
——关于文学的全球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思考	291
文艺的民族性与文艺的世界性	
——关于文艺民族性的几个问题	302
20 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	
——走辩证整合研究之路	319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326
“拉普”文艺思潮简论	335
30 年代苏联文学思想	360
战后苏联文学问题	387
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	430
当代苏联文艺学的结构符号分析	445
巴赫金的“语言创作美学”	
——对话理论	474
当代苏联文艺学方法概观	496
面向 21 世纪的外国文学	
——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	
(1994 年 9 月 20 日)	522
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	
——关于一次有意义的探讨	536
《尤利西斯》在苏联的历史命运	545

“20 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总序	559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苏联文论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	576
主要著作目录	584

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朱光潜先生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里,以及在《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的“绪论”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朱先生说,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是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恩格斯只在“较早的著作”中,“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唯有斯大林“最明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最后,朱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意识形态不是上层建筑,只有法律和政治机构才是上层建筑,并且认为这个看法“并非自我作古,而是一个老问题了”。

关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确是一个复杂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和阐明的问題。朱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见解作了分析和研究,对我们颇有启发。现在,我想就这个“老问题”谈谈自己的肤浅的看法,与朱先生商榷。

一 “三种不同的提法”存疑

朱先生说,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过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提法”。究竟在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那里,是否存在着朱先生所说的“三种不同的提法”呢?依我看来不是这样。